

法租界



▲ 现在的方浜中路街景



▲ 方浜中路 235 号 (北区救火会旧址)

► 如今的北王医马弄 24 号

“南市难民区”分布图

上海师范大学历史学研究生 彭代现 吕园园 绘 吴俊范 指导 新民图表 制图 叶聆 摄影 陈梦泽

百岁老人回忆难民区经历

(上接 A14 版)

饶家驹将南市难民区分成九个区, 各区由办事处派区长一人, 从住户与难民中挑选若干人, 负责管理区内清洁给养等事宜。各区长之下, 分设总务、文书、训导、设计、给养、庶务、卫生、清洁、登记、调查、医务等股, 分别处理各项工作。

“南市难民区至少庇护了 30 万中国难民, 这是非常了不起的。”苏智良说。

除了北区救火会, 苏智良和学生们还新发现了一个此前没有记载的难民收容所, 北王医马弄 24 号, 这是唯一一个亲历难民记着的难民收容所。

此外, 小世界(福佑路 234 号)、福佑路回教堂(福佑路 378 号)、珠玉业公会(侯家路 26 号)、沉香阁(沉香阁路 29 号)、城隍庙(方浜中路 249 号)、豫园(安仁街 137 号), 这些都是南市难民区的难民收容所遗址。

拯救记忆

相比较寻找遗址, 更紧迫的是寻找难民区的亲历者。

“年纪最小的现在也 80 多岁, 现在再不做, 就永远没有机会了, 我们要拯救这一重要事件的历史记忆。”苏智良说。

南市难民区所在的老城厢, 目前大部分都已经完成了动拆迁, 上了年纪的老人, 大多搬到二三十公里外的动迁房里。即便是没有动迁的里弄, 大部分的住户都是解放后搬进来的, 他们与附近小商品市场的外地从业者混居, 对于难民区, 已经鲜有记忆。

为了找到亲历者, 王海鸥、胡皓磊和陈斌三名同学, 用大海捞针的“笨”办法, 先找区域内的所有居委会, 通过居委会找到年龄在 80 岁以上的老人。“有些居委会提供的信息不完整, 我们就多次拜访, 有的里弄没有线索, 我们就挨家挨户敲门”, 有的老人已经拆迁搬走了, 我们就到他们新房子去找, “我们会问他们, 1937 年到 1940 年是否在这里居住, 如果回答是, 那就再详细采访。”一共找了四五十个老人, “很多都是解放后搬过来的, 还有居住在这里但对难民区情况无法回忆的”。

大部分的老人都对难民区一无所知, 有些不愿再揭旧时的“伤疤”, 只有极少数的几个人听家里的长辈说过, 而真正的亲历者, 目前仅找到余阿姣和王晓梅两位老人。

居住在安仁街的余阿姣今年正好 100 岁, 王海鸥他们先找到古城居委会, 说明来意后, 恰巧余阿婆的儿媳在这里工作, 她就带他们带到自己的家里。余阿婆虽然已经百岁高龄, 但阿婆思路很清晰, 带宁波口音的上海话表达很流畅。余阿婆说到日军封锁, 家里不敢点灯, 即便如此, 日军还是会砸门砸窗, 说到这里, 老人情绪激动起来, 说话急促大声, 双手紧握着抬起来。

安仁街的老宅, 已经有百年历史, 这是父亲留给余阿婆的房子, 现在她和妹妹两个人居住在这里。余阿婆现在还能做一些简单的家务, 更多的时候, 她喜欢坐在后门 10 平方米不到的天井里“晒太阳”, 阿婆和周围人的关系特别好, 来来往往的人都会和她打招呼。



■ 亲历者余阿姣(左) 王晓梅(右)



陈斌 摄

街被划分在第二区, 出入口依然被日本兵封锁, 余阿姣和家人住到梧桐路天主堂, 虽然有了暂时的栖身之所, 但日常生活依然饱受日本兵的骚扰。

枪托打, 冷水浇

王晓梅家住在豫园街道北王医马弄。难民区成立后, 王晓梅家边上的方浜路被一分为二, 一侧是难民区, 另一侧由日本军队占领。

“日本兵在这里设立了一个岗哨, 带枪守卫。当时, 要是你路经此地, 必须要向日本哨兵鞠躬, 如果戴了帽子还必须先要把帽子脱掉。假使你忘记脱帽, 就会招惹到日本兵, 日本兵就会拿枪托捶打, 往你头上浇冷水。我很害怕, 因为我人小, 所以还不敢走出来, 我姐姐比我大几岁, 就不敢出来了, 怕被日本人抓。”王晓梅回忆道。

在王晓梅的印象里, 那时的日本兵无恶不作。

“日本兵来了以后, 行为是很恶劣的。我记得我们这边邻居文彬(音)家里的阿公, 有次因为忘记给路口的日本哨兵鞠躬, 日本兵“哗”地冲过来就朝他额头开枪, 还好子弹没打着, 他马上逃掉了。日本兵还在这边强奸妇女, 平时妇女都不敢出来的, 怕被日本兵“抓花姑娘”抓走。当时在这边王医马弄就有个姑娘被日本兵强奸了。还有 27 弄有家山东人家, 姑娘有一次走出来, 就在弄堂口被日本兵强奸了。”说到激动时, 王晓梅数度哽咽。

“当时这边的路上都是有铁丝网的, 像侯家路、方浜路都有铁丝网。当时还有日本飞机轰炸, 我家这边没有被炸到过, 其他地方有。当时我有一个堂哥, 住在南市。有一次轰炸, 炸弹掉下来, 我堂哥的头部受伤了。我们看到他当时捧着头, 跑到对面一个红十字会去包扎伤口。那边平时我们是不

敢过去的, 当时是十分混乱的。”王晓梅说。

用雨伞接馒头

王晓梅未曾见过饶家驹, 但清晰记得当时有个好心的神父。

“我听大人讲, 当时有一个神父, 听说这个神父人很好, 一直做好事, 帮助中国人。”

王晓梅回忆, 北王医马弄成为难民区后, 因为日本兵离家太近, 王晓梅根本不敢在家里住, 晚上她就和姐妹带上一个垫子, 到收容所去过夜。收容所在北王医马弄 24 号, 当时是一个院子, 解放后变成了托儿所。

难民区成立后, 每天都有很多人涌进来, 这也给管理带来了很大的困难, 难民区里的日子并不好过。

“当时的难民收容所也没有人管理, 门口走进走出也没有人管的, 只让你在那边睡睡觉。收容所里也没有东西吃。后来城隍庙附近有茶馆叫得意楼, 那边有施粥施饭的。粥饭也是当时的好心人烧好后拿过去的。我们就每人拿一个碗过去, 还有菜, 是青豆萝卜干。后来呢, 时间久了日子一天越来越困难了。”王晓梅回忆。

最让王晓梅印象深刻的是用雨伞接馒头, 因为日本军队的封锁, 社会上捐赠给难民区的馒头等食品, 不能直接送到难民手中, 只能从铁门朝里扔。

“在东星桥那边, 从(法租界)铁门里把馒头哗哗地扔过来。当时我们姐妹还小, 知道这边在扔馒头就过去捡。去捡馒头的时候我们带上一顶洋伞, 扔馒头时把伞打开, 就可以多接到几个馒头, 否则我们姐妹多, 不够吃。又不敢在人堆里挤, 又挤不过人家, 只能用这个方法。”

而余阿婆则回忆, 不仅仅是食品, 难民区的饮水也十分困难。“在弄堂里的井, 日本兵也来用水, 我们吓得不敢跟日本兵接近, 就没水喝了。”

从豫园管理处往弄堂里走 100 来米, 就是安仁街, 这里曾是南市难民区的一部分。2 米多宽的小马路两边, 都是百多年的老房子, 木质的阁楼, 七八户人家共用的卫生间, 是老上海生活的活化石。

100 岁的余阿婆就生活在这里。路过的老人小孩都会叫她一声“阿婆”, 老人思维依然清晰, 叫得出弄堂里每个人的名字。

“1937 年, 我就住在这里, 知道有个神父, 人很好”。

“东洋兵要想到上海, 几十只兵舰开到黄浦滩。‘八一三’东洋兵冲进闸北来, 杀我佬老百姓, 炸我佬火车站。我佬老百姓大家要拼命, 不管老不管少要打退东洋兵……”85 岁的王晓梅说, 这首童谣曾经每个人都会唱, 她住在豫园街道北王医马弄, “1937 年日本人进上海时, 我只有 8 岁。”

说起难民区的生活, 百岁老太和耄耋阿婆都表示, 虽然名义上是“安全区”, 但日本军队依然胡作非为。

整条弄堂被封锁

余阿婆说, “我出生在安仁街 81 号, 3 岁时搬到 161 号, 我在这边住了约 90 年”。

1937 年开战时, 22 岁的余阿婆一边照顾家里一边帮着父亲照看山东南路的商铺, “当时我家里是做生意的, 爸爸在黄浦区山东南路, 跟别人借了间房子, 开一家卖筷子的店, 有时我也会在店里帮忙。”

开战没多久, 日本兵就进入到安仁街, 粉碎了小巷的宁静。

“日本兵进来了, 我家住的地方就被封锁起来了。日本人把这边的房子炸了, 又重新造。这边原来的两层楼炸掉以后重新建了三层。弄堂两边都不能走了。日本兵在路口这边造了铁门, 另一处前门那边也不能走了, 平时有日本兵拿枪把守, 前门开也不能开。”

一天 24 小时都能看到背着枪的日本兵, “整条安仁街都被锁起来了, 开门的话日本兵会用枪托打。”

“当时我们在这边连吃的水都没有的, 没有自来水, 里面有几口井, 所有人都只靠井水过活。在难民区里面也没有菜吃, 只能偷偷跑出去, 到十六铺, 买一点鱼、买一点米。有一次出去回来时铁门被关掉了, 我没有地方睡, 就到我叔叔那边住, 叔叔住在新城隍庙(淡水路)那边, 在那边住了两夜, 之后通过对面有个日本人的介绍, 我们又回到了这里。”

1937 年 11 月 9 日难民区成立, 安仁